

持續推行國安教育 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今天是第十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自2019年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再到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香港社會實現了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歷史性轉變。在此過程中，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愈發突出。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美國對華發動關稅戰、科技封鎖等手段，嚴重威脅中國經濟安全，進一步證明了國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唯有持久不懈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特別是加強對青少年的引導，才能築牢國家安全防線，抵禦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

陳子遷 吉林省政協委員 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修例風波暴露出本港國家安全教育的缺失。當時，外部勢力干預，極端思想滲透，導致社會秩序被破壞，政治亂象頻生。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迅速扭轉了這一局面，社會秩序迅速恢復，法治重回正軌。去年立法會審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進一步完善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使香港邁向長期繁榮穩定。這一系列變化表明，國家安全教育不僅是法律層面的要求，更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石。

國家安全涉及多個領域

國家安全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多個領域，任何一環的疏漏都可能給國家帶來系統性風險。國家安全不僅涉及傳統意義上的政治、軍事安全，經濟安全同樣至關重要。所謂經濟安全，是指國民經濟能夠抵禦國內外各種經濟風險而保持平穩有序運行的態勢。

近年來，美國對華加徵關稅、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打壓中國企業，正是對中國經濟安全的直接挑戰。這些行為不僅影響國際貿易，更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威脅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正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所言，國家安全不僅包括武力等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安全，近期美國宣稱加徵所謂「對等關稅」亦威脅國家安全中的金融領域安全，讓市民更加意識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面對外部勢力的無理打壓，香港市民要更加團結，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特區政府須加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才能有效抵禦外部風險。國家安全教育不能僅停留在特定紀念日，而應成為常態化、系統化的教育內容。

方式須與時俱進應對新風險

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他們的國家安全意識直接影響國家的長遠穩定。近年來，外部反華勢力通過社交媒體、文化滲透等方式，試圖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因此必須從教育入手，讓青少年深刻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國家安全教育應結合現實案例，引導青少年理性思考。例如，通過分析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的對比，讓學生明白法治與穩定的關係；通過解讀美國對華經濟打壓的案例，增強青少年的經濟安全意识。此外，學校課程應融入國家安全內容，同時結合實踐活動，如模擬法庭、國家安全知識競賽等，使教育更加生動有效。

維護國家安全不是一時之事，而是必須持之以恆地進行。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新的安全挑戰不斷湧現，如網絡攻擊、數據安全、生物安全等新興領域風險日益突出。國家安全教育更須與時俱進，持續深化。政府、學校、媒體、社會組織應形成合力，構建全方位的國家安全教育體系。特區政府可推動立法保障國家安全教育的實施；學校應將國家安全納入必修課程；媒體可通過紀錄片、專題報道等形式普及國安知識；社會組織可舉辦講座、展覽等活動，增強公眾參與感。只有社會各界齊心合力，國家安全意识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國家安全是國家的根本利益，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從香港由亂到治的歷程，到應對美國經濟打壓的實踐，都證明了國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香港必須持續、恆久地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特別是加強對青少年的引導，築牢國家安全防線，才能有效抵禦國內外各種風險，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完善數字治理體系 保障國家安全

黃錦輝 立法會議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今天是第十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當前，國家安全教育早已突破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和國土安全範疇。國家安全重點領域已擴展至經濟、金融、糧食、文化等新興領域。特別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科技、網絡、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也已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部分。中國早在2017年就已頒布實施《網絡安全法》，以維護國家網絡主權並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2021年，《數據安全法》出台，確立了國家數據安全治理體系的基本框架。同年，《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施行，對個人資訊處理活動進行規範，切實保障公民個人資訊權益。

建立完善AI法律監管體系

在人工智能監管方面，國家於2023年發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相關領域進行了規範。至於香港，目前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具備了較為完善的法律規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早於1990年代即已生效。近年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陸續推出多項人工智能相關指引，包括2021年發布的《開發及使用人工智能道德標準指引》及2023年推出的《人工智能（AI）：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鑑於AI技術已在職場廣泛應用，公署近期更適時發布了《僱員使用生成式AI的指引清單》。

國家正積極推進「人工智能+」行動計劃，探索多元化AI應用場景以推動高質量發展。香港最新財政預算案亦明確提出全力發展人工智能技術，預計將有更多機構採用AI提升運營效率。在此背景下，《指引清單》的出台為機構及僱員提供了實用指引，既促進生成式AI的安全應用，又有效保障個人私隱權益。

然而，私隱保護僅涉及個人及企業層面。要全面保障國家安全，必須同步推進數據安全與網絡安全的制度建設。儘管立法會近期通過了《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但該條例主要聚焦提升關鍵基礎設施的電腦系統防護能力，其立法

深度和廣度均無法與內地的《網絡安全法》相提並論。國家的《網絡安全法》不僅涵蓋技術層面的網絡安全保障，更從國家戰略高度確立了網絡空間主權原則，其立法目標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構建清明網絡空間等多重價值維度。

在人工智能的法律規制方面，無論是針對數據訓練過程中的私隱保護與倫理規範，還是應用場景中的責任認定與監管機制，香港目前尚未建立起系統性的立法討論框架。這一情況既反映出社會公眾對相關議題的認知程度有待提升，也暴露出政策制定層面存在明顯的制度空白。隨著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場景的快速擴展，建立完善的AI法律監管體系已成為不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築起文化安全屏障

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領域是文化安全，而文化安全是指一個民族的精神信仰、價值體系、思想傳統等觀念形態所構成的文化特徵與文化主權，能夠免受外部威脅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意識形態傾向與文化特質，根本上取決於其所採用之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數據來源與內容篩選機制。

過去，主流的大型語言模型主要依賴西方數據進行訓練，難以生成蘊含中國或東方文化特徵的內容，甚至可能在無意中削弱使用者的中華文化素養。然而，今年以來，多個高效且免費的中國人工智能模型相繼問世，如DeepSeek、通義千問QwQ-32B等，成功扭轉了這一局面。

香港本土研發的HKGAI V1大模型，正是基於內地DeepSeek模型進行優化和再訓練，確保系統能夠傳承中華文化精髓。該模型計劃於今年內開放公眾使用，預期本地學校及機構將積極採用這一免費的本地化模型，從而為人工智能領域築起文化安全的屏障。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凸顯多領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香港雖在個人資料保障方面法規先行，但在網絡安全與數據安全等關鍵領域的立法進程仍顯滯後。當前國際形勢動盪多變，建立全方位的國家安全防護機制實在刻不容緩。

反制關稅訛詐 維護多邊貿易體系

何偉文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 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

自4月2日特朗普宣布對全球加徵所謂「對等關稅」以來，全球股票市場大起大落。4月9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對部分國家和地區暫緩實施「對等關稅」90天，進行逐一談判；又宣布，對中國關稅不僅不暫停，反而一路加碼到145%。特朗普並稱，如90天達不成協議，關稅照樣實行，還可能更高。為什麼許多國家和地區選擇不反制而進行談判，中國卻毫不猶豫進行強硬反制呢？這基於兩個基本大是大非，一個關係到世界多邊貿易規則體系未來，一個關係到中國主權和發展。

維護多邊貿易 履行大國責任

1930年大蕭條期間，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對全球進口商品大幅度提高關稅，企圖保護本國工業和就業，結果招致英法加等國加徵報復性關稅。此後4年，美國進口下降66%、出口下降61%，世界貿易下降60%。美國大蕭條不僅沒有因關稅緩解，反而因此拖延和加深，GDP累計下降5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英法等國在布雷頓森林開會，商討建立戰後世界秩序，其中在經濟貿易方面締結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各國通過談判，大幅度降低關稅，建立基於非歧視最惠國待遇、公平而自由的貿易體系。到1995年，關貿總協定被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

戰後建立的多邊貿易體系，有力地保障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繁榮。這個體系的基點，是各國關稅和其他非關稅措施通過多邊、區域或雙邊關稅談判，在利益均衡基礎上確定並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得單方改變。世界多邊貿易規則體系，是世界經濟增長、全球供應鏈保持穩定的基本保障。

特朗普單方公布的對世界各國的「對等關稅」，恰恰是對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的直接對抗和挑戰。因為「對等關稅」沒有經過WTO框架下的談判，沒有WTO的認可，完全是非法的，其性質和破壞性類似《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使世界回到關貿總協定前時代，帶來歷史的大倒退。各國對美國「對等關稅」的應對，關係到世界經濟、貿易前景和多邊貿易體系的存亡。中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和多邊貿易體系的堅定維護者，必須強烈反對和強力反制，這既是維護世貿組織規則和多邊貿易體系的需要，也是中國的大國責任。

維護中國主權和正當權益

美國對中國濫施高關稅，直接損害了中國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經濟發展、出口、就業的正當利益，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必須堅決反制，維護我國國家和企業的正當利益。

特朗普將單邊關稅冠以「對等」之名，實際上與「對等」毫無關係。美國把對華貨物貿易逆差除以從中國進口額，得出逆差率，再除以二，算出要對

華加徵34%關稅。這是種奇怪的計算，毫無經濟學和經濟邏輯，因為貿易順差或逆差的經濟基礎是比較優勢，是產業鏈上的不同分工。隨着中國堅決反制，特朗普便立即把對華關稅從54%加碼到104%、125%，再加到145%，這與逆差率毫無關係。他又揚言，對凡是與美國談判並讓步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降低關稅，這還是與逆差率無關。因此，特朗普的「單邊關稅」，僅僅是美國為了一己之私，無視多邊貿易規則，以霸凌主義欺凌其他國家的漂亮外衣罷了。

實際上，由於關稅是由美方自己承擔，據耶魯大學有關研究，這將使美國消費物價上升2.1至2.8個百分點，每個家庭每年額外增加4,200美元負擔。過去一周，美股恐慌性暴跌，尤其是美債市場危機苗頭加劇，美元則跌到2022年以來最低水平，美元資產迅速失去市場信任，這才是特朗普政府緊急宣布對部分國家和地區暫緩「對等關稅」90天的真實原因。

就特朗普對中國層層加關稅，中國也把從美進口所有產品關稅提高到125%，並對美方再度提高關稅不予置理。

無懼美方阻斷中美經貿

對特朗普故意用極高關稅阻斷中美經貿關係，中國一反對，二不怕。中國是全球貿易大國，2024年前三季度中國出口佔國際市場份額達到14.5%，較2018年提高了1.8個百分點；而去年對美出口已從2018年的佔中國總體出口的19.2%下降到14.7%。同時，中國更大的市場在國內，據世界銀行統計，2023年中國貨物與服務出口佔GDP比重只有19.7%，即五分之四的市場在國內。國內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市場，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底氣。

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希望與中國談判，中國也始終願意和美國談判，但任何談判都必須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因此，前提是美方取消加徵的單邊關稅，遵守WTO規則。在此基礎上，美方可以充分提出它們的關切，雙方本着相互尊重、尋求合作共贏的方向一起努力。如果這樣，雙方都能夠獲益。

中美建交46年以來，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24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的6,882億美元，累計增長275倍，是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雙邊貿易增長，為兩國經濟和人民都帶來了巨大利益。截至2023年底，美國在華累計直接投資達到982.3億美元，當年實現銷售額4,900億美元，超過了美方統計的美國從中國進口額。美國廣州政府、企業界，始終願意並積極發展對華經貿合作。中美兩國基於產業鏈分工和市場規律形成的互補互利關係，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在歷史的長河中，特朗普政府錯誤的關稅政策對中美經貿關係造成的重大破壞只會是暫時的。中美兩國平等互利的經貿合作，具有巨大的發展前途。

強化社區支援網絡 拓兒童成長空間(上)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我們常說「孩子是未來」，但孩子的未來往往早已被他們所成長的社區所塑造。近年來，來自大數據與經濟學的研究不斷揭示，社區環境不僅決定兒童的生活質量，更可能影響他們成年後的收入、教育水平與社會流動機會，對人一生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對香港而言，這些實證研究帶來了重要啟示：若希望下一代擁有更公平的起點，就必須從根本改善他們的成長環境，讓「兒童友好型社區」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方向。在這一方面，特區政府近年來推行的關愛隊計劃，正好提供了一個具潛力的社區支援網絡。未來關愛隊不只提供短期支援，更應結合數據導向的策略，成為推動兒童成長與社區轉型的關鍵力量。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4月10日宣布，第一期關愛隊服務將於今年第三季告一段落，第二期將無縫接棒，繼續服務社區。截至今年1月底，全港關愛隊已完成超過39萬次家訪，提供4.3萬次家居及其他支援服務，舉辦2.3萬次地區活動，體現了社區服務的廣度與深入，也反映特區政府正嘗試通過制度化方式，加強社區與居民之間的聯繫。行政長官李家超亦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將恆常化關愛隊制度，並把下一階段的資助金額提升五成，推動服務「更順暢、做深、做廣」。

活用大數據助優化資源配置

若要進一步提升市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關愛隊的角色應不斷進化，不僅止於基礎服務，更應深度嵌入社區結構，特別是兒童成長的支持體系之中。為此，特區政府須借助大數據與經濟學的力量，科學識別社區需求、評估服務效果，並優化資源配置，推動關愛隊成為以數據驅動、成效導向的社區轉型關鍵力量。

長期以來，市民普遍認為孩子的成長受到家庭與學校的主要影響，但以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拉傑·切蒂為首的研究團隊，利用美國稅務與教育數據，以大數據與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數百萬兒童的成長路徑進行了長期

追蹤，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兒童成長的社區質量，與其未來的經濟成就成正比。

研究顯示，在最優質的社區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其成年後年收入平均比其他地區高出12%；而當一個社區在教育水平、家庭結構與社會凝聚力等方面每提升一個標準差，兒童成年後平均收入可提升13%。這些影響並非主要來自學校，而是源於社區整體氛圍、文化與結構性因素所構建的「軟環境」。這類環境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孩子的價值觀、行為模式與發展預期。

社區環境對兒童成長影響深

切蒂團隊進一步歸納出三個可量化、具預測力的社區指標：其一，大學以上學歷居民比例，反映社區的教育氛圍與知識資本，對孩子的學業期望與文化認同具有深遠影響；其二，雙親家庭比例，代表家庭結構穩定性，是兒童獲得情感支持與行為規範的重要基礎；其三，人口普查問卷回收率，象徵社區的社會凝聚力與居民參與度，體現出集體責任感與社會資本。這三項指標從教育、家庭與社會參與三個維度，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參照標準。

這項研究的關鍵，在於它並非個別案例的觀察，而是建立在海量數據與多變量回歸模型基礎上的系統性分析。通過整合來自稅務、教育、家庭結構與人口遷移等領域的數據，切蒂團隊揭示了社區環境如何在長期、結構性層面上影響兒童的發展軌跡。對任何關注兒童福祉的社會而言，這類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政策啟示。

除了切蒂團隊的研究，另一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前谷歌數據科學家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茨也在其著作《數據、真相與人生》中，提出高度契合的觀點。他強調，許多決定孩子一生命運的重要決策，其實在出生後不久就已經發生，而人們依賴的「直覺」，往往是最不可靠的參考。根據他的研究，父母在孩子出生第一年平均要作出多達1,750項關鍵決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我們應該住在哪裏？」

(未完，明日續。)